

上海有两千多万人,两千多万人眼里的上海,也应该有两千多万种吧?作为这两千多万人之一,我自然也有自己眼中的上海。我去过外滩、崇明岛、松江醉白池、金山嘴、南汇嘴……这些是上海,但肯定不是全部上海。

算起来,对我来说最为特别的“上海”,是在我刚毕业后见到的——很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段日子写成长篇小说,那应该是我的《上海屋檐下》或者《七十二家房客》。

那是2010年夏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在复旦周边住了两个月,随后搬到了华师大一村。之所

上海一页

甫跃辉

以搬到这儿,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房租便宜。之前租住在复旦周边,住在二房东改造后的一间稍微大一点儿的房间,一个月得一千块钱,到了华师大一村,因为朋友的关系,一个月只用五百,而且,两个地方的面积并没多大差别,更何况,一村的房子还是独门独户的。

华师大一村,顾名思义,肯定在华师大周边。具体说来,一村和华师大普陀校区的校园,只有一

这些年来,中国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发展时代,不仅很多地方都通了高铁,很多城市也都修了地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上海开通了地铁1号线,可只有很短的一节,从徐家汇通到锦江乐园,现在看来,几乎等于不存在。那时,我家住在五角场,工作单位却在徐家汇的交大,并且到交大后,还要乘班车到闵行二部去上课,可以说是从上海的东北角斜切到西南角。

那些年,我们还没有地铁

张生



每次我都从五角场乘55路车出发,再到新开河换26路电车到徐家汇的交大,喘口气后再奔赴闵行,这大概可称得上是上海最漫长的通勤。有时,在公交车的颠簸声中,我会感觉自己像是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中西文化交织的历史中穿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计划”建成的中国古典式样的建筑开始,有红墙的江湾体育场、黄色琉璃瓦屋顶的同济中学;再一路经过八十年代的多层新工房;然后是外白渡桥、苏州河、黄浦江,外滩有着高耸的钟楼的海关大楼、漂亮的西洋古典主义的老市府大楼、十六铺码头,再到淮海路、长乐路,最后到徐家汇,远远可以看到天主堂的两个高耸的尖顶。而我这一路就像是在欣赏一幅有声有色的长卷,那弯曲的街道,充满时代印记的建筑,总是给我以无限的遐想。后来55路换成双层大巴,我早上有课的时候,五点多就起来,去赶头班车。我总是在发动机散发出的温暖而呛人的油烟中,坐在上层的第一排座位,看着黑夜中明亮的路灯和空空荡荡的马路,感觉既像是驶向这座城市的历史的深处,又像是驶向这座城市光明的未来。

当时上海的很多道路并未拓宽和取直,尤其是上下班时间,公交车又常常堵得厉害,动辄两个小时。为了不耽误赶上学校的班车或者早点回家,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自行车穿行在五角场和徐家汇之间。当时我只有二十多岁,体力很好,也不觉得累,再加上骑自行车比公交车自由,后来就一路骑了下去。也是在不知不觉中,上海的地铁越来越长,私家车也越来越多,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也开始像身边的很多人一样开始乘公交车或打的,再换乘地铁。

地铁在隧道中一站又一站呼啸着,看不见风格各异的建筑,宽窄不一的街道,也看不见历史的变化,只有一节又一节忽明忽暗的相同的隧道。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之前乘公交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日子。那时有温暖的阳光照在我睡眼惺忪的脸上,让人觉得公交车就像是行驶在迷人的尘梦中。那时还有风吹的雨滴打湿我的塑料雨衣和我的眼镜片,让我的自行车前的街道变得像是一幅模糊的印象派绘画;还有公交车轰鸣着排出的油烟味和路边的面包房飘出的香味,似乎都给人以无穷的念想。

如今这一切已经成为陌生又熟悉的梦境。

也许,我们的人生总是处于矛盾中吧。地铁在地下给了我们之前梦寐以求的现代的速度,但也剥夺了我们感受地上丰富的现实世界的温度,这或许就是我时不时会怀念之前那些没有速度的公交车和自行车时代的原因吧。

门之隔。过了这道铁门,那边就是华师大出版社、华师大的宿舍和餐厅……而这边呢,是一栋栋老旧的楼房,尤其我住的那栋,更是老旧。

那是紧挨着铁门的一栋筒子楼,我住的是靠近小区内部的一间,也就是说,从窗口望出去,是看不见华师大校园的。看得到的,是小区内部的一栋栋老楼和楼下悬铃木掩映的一条小路。窗边有我的对着墙的小书桌,还有一把躺椅,躺椅边上,是一张挺宽的床。很多个不上班的日子,我醒来了,便躺在床上,听窗外树上的鸟鸣一点一点一点点稠密明亮起来,楼下刷刷啦啦扫帚扫过了地面,人也渐渐稠密和明亮起来。另一边,门外的甬道里,开门声关门声脚步声说话声,也渐渐开始在无数堆积的杂物间冲撞。我可以一直听得到甬道中部水房里的水声、刷牙声和开关卫生间门的声音。在这一个个声音里,门和墙,仿佛是不存在的。

有时会睡到很晚,有时也起得挺早。起得早,往往是因为有人来喊我起床。喊我起床的人,是华师大退休教师王智量。那时候,智量老师还没有后来那么有名,在大家眼里,他不过是个秃了头、笑眯眯、说话温柔的小老头儿,并不关联那位经历坎坷的俄语文学翻译大家。智量老师住在小区一栋房子里,那是一套特别逼仄的套间房,也只能说,条件比我这儿略好一些。智量老师敲了门,我赶紧穿衣起床,把他让进屋里,让他在躺椅上坐了,我便拿了东西到水房去洗漱。洗漱完回来,智量老师看着我无声地笑了。我们关了门,一老一少下楼,穿过那道铁门,到华师大校园里散步。

铁门边的墙上,有一块公告栏。与其说是公告栏,不如说是讣告栏。智量老师常常弯着腰,头微微往前倾,盯着讣告上的名字,许久,喃喃说,某某某,我们同事过啊,他怎么就走了——如今,就连智量老师自己,也早早被贴到这公告栏上了。

我和智量老师在校园里走一走,听他讲一讲过去的事,胡适、何其芳等等这些书本上的名字,都和他有过交集。我忍不住朝他看去,仿佛能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一个已然远去的时代。

除了智量老师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我在筒子楼里接触的,更多是租住在这儿的“小老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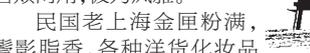
这栋楼,原本是华师大青年教师宿舍,如今,是没有老师住这儿了。现在住这儿的,主要是三类人,一类是老上海人,一类是外来打工人,还有一类,就是我这样的刚离开校园的大学生情侣,男的高大,肥



草长莺飞的时节,都市丽人们的妆造肉眼可见地鲜妍了。适当化妆早已被视为“得体”的必需组成部分,除了装点门面,还有显著的心理暗示和疗愈功能。将该隐的部分隐,该显的部分显,完成对己实现和对他魅力,化妆很是考量综合素质与实操能力。

中国古代就有成熟的化妆术:最流行的修容是落葵加米粉,能均匀修正肤色;宫廷女子用的定妆粉是珍珠粉,百姓则用滑石粉;《莺莺传》中张生送给莺莺的伴手礼是一支管状口红;眉笔最早是用细柳条烧成的碳制成的,后又演变为石黛磨成细条,而《甄嬛传》中宠妃画眉用的螺子黛原料是地中海海螺碾磨成的细粉,可谓进口高奢彩妆,《说郛》中有载:“螺子黛出波斯国,每颗值十金”;《红楼梦》中上等胭脂的上妆方式是“只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打颊腮的了”,唇颊两用,极为风雅。

民国老上海金匣面粉,鬓影脂香,各种洋货化妆品如八面来风,新式国货化妆品也接踵研发。深谙时尚的张爱玲是美妆达人。1995年她于洛杉矶的家中离世,遗物中除手稿、假发之外,最多的就是口红。她初中时第一次赚到钱,是《大美晚报》给的稿费五元,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据说会变色。作为美国老牌彩妆,丹祺口红曾风靡好莱坞,在二战期间还打出经典广告——“战争、女人



和口红”;而美国彩妆品牌MaxFactor,其充满东方韵味的中译名“蜜丝佛陀”也出自这位女作家的手笔。白先勇似乎也很欣赏蜜丝佛陀,迷人的尹雪艳不喜胭脂,只涂它的裸色唇膏。

韩妆的流行极值似乎在2015、2016年那会儿,韩妆长于修饰日常,拒绝猖狂色彩,将极致人工雕琢成极致自然化,也催生了“妈生感”等流行词汇。而日本女性重视

擅长打造大女主妆造。《新闻女王》里的几个女性角色都化着适合搞事业的职场妆容,适合丛林捕食,全然没有韩剧女主那种毛茸茸的幼态感。

上海职业女性化妆多以精致淡妆为主,很少用力过猛,推崇氛围感。某日本公司曾对七大城市的一千多名女性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女性喜欢带有青色的华丽妆容;上海女性喜欢米色和玫瑰粉色等温柔色彩,注重基础妆容;台北女性最想给人的印象是知性女人味,最注重眉毛;首尔女性是七城中化妆耗时最长、步骤最多的,强调眼线和口红;东京女性眼妆较浓,口红光亮;曼谷女性重视粉底、眼影和口红;纽约女性最注重睫毛膏、眼线和口红。

美人在骨也在皮

何菲

化妆的传统从平安时代就开始了,精雕细琢,孜孜以求,十分极致,如今很多人每天使用的化妆品高达六七十种且高频率补妆。近年来,中国国产彩妆市场迅速崛起,彩妆圈掀起了国潮热,许多女性对于妆容的偏好也由日韩风,嬗变为国泰民安风。某著名国产彩妆品牌曾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出地理眼影盘,表现祖国山河之美的同时,复刻了中国地貌线条的特色,极具温度与匠心。

在中国香港,通勤妆侧重光影修容,有棱角的立体脸是职业女性的审美偏好。并不强调假睫毛,却将眉妆视作决定妆容整体气质的重要部分。这让我想起上世纪90年代那些各具风情的港风美人,比如钟楚红的立体粗眉、关之琳的自然弯眉等,都令人过目难忘。TVB

上。这情形,多少有点儿暧昧,还好,我进屋时把门大开着,楼道里人来人往。我们聊了许久,我才知道,他男朋友是做房产中介的,但入职至今,还没卖出去一套房子,没有提成,收入很低。不多时,听到楼下电动车停车声,她忽地起身,往屋外疾走,说她男朋友回来了。我有些懵,这怎么能确定是她男朋友?过了一分钟,果然,他男朋友出现在对门,回头看我们开着门,笑着和我打了声招呼。

后来,又听他们吵了好几次。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骑了电动车,过苏州河上的大桥时遇到了他们。难得的,他们有说有笑的。他俩慢慢地推着电动车。我也下了车,跟着他们推车走。没聊两句,他们便说,他今天卖了一套,个人提成有五万多。

没过几天,他俩搬走了。他们没有告别,我们甚至从来没问过对方叫什

么名字。

如今回想起来,还真是奇怪。在这筒子楼里租住了五六年,认识了那么多邻居:东边紧挨着的江西一家七口,西边紧挨着的两个合租的山东女孩,斜对门特别喜欢做饭的大哥和他特别喜欢美食的妻子、一位独居的上海老太太、一户招赘了外来女婿的上海人家、一对在华师大做保洁的上海中年夫妻,等等等等,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没问过我的名字。但我们见了,总会打一声招呼的。

近十年过去了,我早已买房搬走,只去年年底回去过一次。邻居们几乎还是那些邻居,见了他们,我也记得他们,记得在这栋老房子里度过的日子。如今兜兜转转,我调了工作,成了华师大的老师,但一直想以此为背景的小说却迟迟未动笔。也许,明天就动笔。

如今回想起来,还真是奇怪。在这筒子楼里租住了五六年,认识了那么多邻居:东边紧挨着的江西一家七口,西边紧挨着的两个合租的山东女孩,斜对门特别喜欢做饭的大哥和他特别喜欢美食的妻子、一位独居的上海老太太、一户招赘了外来女婿的上海人家、一对在华师大做保洁的上海中年夫妻,等等等等,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没问过我的名字。但我们见了,总会打一声招呼的。

近十年过去了,我早已买房搬走,只去年年底回去过一次。邻居们几乎还是那些邻居,见了他们,我也记得他们,记得在这栋老房子里度过的日子。如今兜兜转转,我调了工作,成了华师大的老师,但一直想以此为背景的小说却迟迟未动笔。也许,明天就动笔。



编者按:不薄新书爱旧书。旧书是特殊“文物”,承载着丰厚的文化积累和历史底蕴,蕴含着常读常新的知识理念与风雅韵,让读者触摸时代的痕迹,让学人得到涵养精进。上海历来是全国古旧书流通的中心之一,传承文脉,传递书香。今起邀请学者、出版人、古旧书从业者、书店人、藏书人等,说说“旧书新知”的故事。

如果不算初中时期到上海旧书店提篮桥门市部和四川北路门市部选购“文学小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和“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的旧书,我第一次较大规模地购买旧书,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那时我正在北京朝内大街人文社参加《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的定稿工作,星期天休息,

常去灯市口中国书店门市部浏览。一次在书架上见到一批二十多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旧书,大都有原主人赵燕声的签名,购于何时何处之类,有的还有他的眉批。我马上意识到这些书对我的研究工作有用,机不可失,悉数购下,花了我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可算是“豪举”了。后来我才知道,赵燕声其人并非等闲之辈,他收藏的新文学书刊甚多,新文学藏书家唐弢先生当年曾得到过他的赠书。他与萧善仁、苏雪林合作编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1500种提要》(1948年北平怀仁学会版),他还曾在1948年9月上海《文潮月刊》第5卷第5期发表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先行者,近年来已有人在专门研究

这位差点被遗忘的新文学藏书家了。

因此,从一开始,我对旧书的爱好、搜集和考证,就与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密切相关。当年去图书馆访书不易,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旧书与我

陈子善

可查,那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寻找旧书。不仅在上海、北京,每到一地,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去当地的旧书店、旧书集市和旧书摊逛,碰碰运气。上海文庙、北京潘家园、天津海河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更是文庙的常客,那些年每周必去,一批林语堂旧藏的胡适、周作人、丰子恺、梁宗

岱、老舍等名家的签名本就得之于文庙。近年来又发展到参加拍卖会,从线下到线上,乐此不疲。

我所收藏的新文学旧书为我的研究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很多方便。记得参编《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我提供了四十年代女作家施济美的唯一的长篇《莫愁巷》。这部小说最初连载于1948年5至10月上海《幸福》第2卷第5至10期,未完。书稿被《幸福》编者沈寂带到香港付梓,但书出版时他已返沪,未能见到。他嘱我寻觅,我一直未见,只搜得一本改换了书名的港版翻印本。我想既有翻印本,必有原本。我不灰心,继续留意,终于得到1951年11月香港大众出版社初版《莫愁巷》,可惜沈先生已不及亲见了。

对我而言,旧书不但是先

辈心血的结晶、手泽的遗存,更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启发了我的研究思路。旧书也让我明白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多么丰富多元,不仅有新文学,也扩大到了近现代通俗文学;不仅有文学创作和评论,也扩大到了文学翻译。现成文学史著述中缺失的许许多多作品,正是通过旧书这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重现在我眼前。

我对旧书是有深厚感情的。而今,我虽已年近八旬,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我还会寻觅寻觅,尤其是那些我还未见过的初版本、增订本、签名本、毛边本、土纸本、自印本……

十日谈 套用杜甫的诗,就读书而言,我是不薄新书爱旧书。

旧书新知 责编:郭影